

笔走老美 肖复兴专栏

费城浪漫曲



肖复兴，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。曾到北大荒插队。

费城市中心有座公园。周末的黄昏，我走进公园的时候，沿着甬道一路看见好几位街头艺人，在演奏萨克斯和吉他，或自吟自唱，他们的身边放着一个纸盒或自己的帽子，供游人往里面放钱。这算是这座公园的一景吧。附近居住的人，逛商业街逛累的人，都愿意到这里来，顺便听听他们的演唱，他们的技艺正经不错呢。

走到公园深处这座水池前的时候，看见两个华人小伙子正在演奏小提琴，听不出是什么乐曲，旋律如怨如诉，格外幽婉抒情。二重奏的效果非常好听，起伏的鸽子一样，在身边翻飞萦绕。忍不住坐在水池边倾听，才发现四周已经坐着不少人。好听的音乐总能如磁铁一样吸引人。

起初，我以为和刚才看到的卖艺者一样，这也是两个街头艺人，但我很快否定了自己的这个猜测。两个小伙子都穿着笔挺的西装，白衬衫配黑裤子，黑皮鞋，非常正规的演出服，根本不像刚才看见的卖艺者那样穿戴随便，有的简直就像嬉皮士。而且，他们的身边也没有纸盒或帽子，如果是卖艺者，人们往哪里给他们放钱呢？

那么，他们为什么到这里演奏？便猜想或许是音乐学院的学生，利用周末到这里来练练手，为将来的成功先奏响一支序曲？

就在这时候，忽然看见一男一女两个白人走到演奏者前面小小的空场里。我仔细打量了他们一下，两人都很年轻，男的长相英俊，女的容貌秀丽，只是和两个演奏者相比，他们的穿戴实在太随意了，每人的手里还各牵着一只小狗。心里想，一定和我一样，也是来逛公园的，听到这样迷人的音乐，忍不住跳进去翩翩起舞。

小提琴声还在轻柔地飘荡着，仿佛因为有人走到他们面前捧场而拉得格外来情绪，声音显得越发柔婉悠扬，拉得人心都跟着一起绵软得要融化了。只看那一对男女手牵着手，来回转圈，轻轻地随着乐曲舞动了起来。由于节奏很舒缓，他们的步如同踩在云朵里，轻柔得几乎看不出来。然后，女的把自己的牵狗

绳交给了男的，本来一边一只的小狗，聚拢在一块，和他们的主人一样欢快地亲热起来。女的腾出了两只手，伸了出来，轻轻环绕在男的脖子上，一双天蓝色的眼睛，那么近地望着男的。

人群里有人叫了一声：吻一个！男的很矜持，微微地笑了，低下头，吻了一下女的。人群里响起了掌声。女的忍不住紧紧地拥抱着男的，头靠在他肩上，一头金色的长发如金色瀑布一样流泻下肩头。

如果是一般人，这时候是恰到好处的高潮，有音乐，有掌声，有热辣辣的夕阳，该退场了。谁想到他们两个人却有些恋恋不舍，就像两只戏水的鸳鸯，舍不得离开这样清澈的水池。当女的把头从男的肩头上抬起来，男的扶着她的纤纤细腰，轻轻地兜了一圈，长摆的连衣裙兜起一个漂亮的弧。然后，他们紧紧地拥抱，又密密地接吻。掌声再一次响起。那一刻，我以为周围的观众在起哄，我甚至以为是是不是在拍摄电影。但我看了一下，人们很真诚地望着他们，不像我们这里爱起哄架秧子，树丛中也没有摄影或摄像机。而两位小提琴手似乎没有受到任何干扰，一如既往地拉着小提琴，琴声没有中断，如同两泓长长的泉水潺潺地流淌。

这一对男女如此往复了好多次旋转、拥抱和接吻之后，男的把自己手指上的一枚铂金戒指戴在女的手指上的时候，最后一次掌声响起来。我和在场的所有人此刻都明白了：一切是他们的安排，地点是他们选定的，琴手是他们请来的，效果是他们设想的，只有夕阳和我们是请自来的。他们把自己的求婚仪式别出心裁地放在了这里，放在了小提琴幽幽的旋律里，一定让他们自己感动了。我都有些感动，对比我们国内的豪华宴席、高档名车，乃至九百九十九朵玫瑰式奢靡却千篇一律的示爱、求婚或结婚的仪式，他们的朴素和新鲜，需要智慧，更需要对爱的理解。

我看到，他们手挽着手向两位小提琴手走去，琴手收弓了，他们笑着与琴手握握手致谢。夕阳的余晖，正打在他们脸上，还有那枚戒指和两把小提琴上，跳跃着金子般的光亮。

呼吸之间 刘亚伟专栏

庭院情结



刘亚伟，笔名亚子，北师大研究生学历，原籍曲阜，下过乡，当过兵，资深报人，现为自由作家，出版长篇小说《科普通读物》等十余种。

庭院生活是许多中国人割舍不掉的一个情结，我看见许多住在高层建筑一层的人，还千方百计地在楼前为自己围出一个小院。庭院情结，实在是一个具有民族色彩的文化记忆。

早在西周春秋时期的最早史诗与《诗经》中，就有了“秩秩斯干，幽幽南山”这样的描述靠近河水，面对青山的家居建筑的颂诗。在后来的中国古典诗词中，“庭院”更是一个频频出现的意象：“庭院深深深几许？杨柳堆烟，帘幕无重数。”“窗前谁种芭蕉树？阴满中庭：阴满中庭，叶叶心心，舒卷有余情。”“小院栽梅一两行，画空疏影满衣裳。冰华化雪月添白，一日东风一日香。”真可谓不胜枚举。

家居庭院之所以能给人留下这种诗情画意的感受，主要因为中国建筑文化观念上的象法宇宙、淡于宗教、浓于伦理、亲地倾向与恋木情结。

中国人审美的着眼点，是功能、关系、韵律，比如：阴阳、和同、气势、韵味等等。它们强调的不是对立，不是崇高，不是非理性的信念，而是对立面之间的渗透和协调，是内在生命意兴的表达，是情理结合，是情感中隐藏着智慧以得到现实人生的和谐与满足，是情感性的优美，总之就是一种“中和”的原则。这种原则体现在中国传统民居建筑上，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庭院。

庭院是封闭式住宅，对外只有一个街门，关起门来自成天地，具有很强的私密性，非常适合独家居住。院内，四面房子都向院落方向开门，一家人在里面和亲和美，其乐融融。庭院比例方阔，宁静亲切，尺度合宜，可在院内植树栽花，饲鸟养鱼，叠石造景，是十分理想的室外生活空间。回廊把庭院分成了大小几个

空间，互相渗透，增加了层次、虚实和光影的变化。居住者不仅享有舒适的住房，还可分享大自然赐予的一片美好天地。

中国人的庭院生活，从可供考证的商代庭院遗址开始，已有 3000 多年的发展史。

围绕着人与自然这个永恒的主题，我们的祖先融汇了太多的诗情画意，变换出无数或简练或丰富的建筑空间。“俯视清水波，仰看明月光”，“苔痕上阶绿，草色入帘青”。在庭院里，“天人合一”的情怀得到了很好的体现。

我常想，在那样一种古典纯净的庭院里，过着那样一种温馨清幽的日子，家人们之间是温良恭俭让的关系，从这样的家居中走出来的人，会是如何出类拔萃，不同凡俗。

看看现在的孩子，他们从小就住着规律的单元楼，伴随他们度过童年的是变形金刚、芭比娃娃和电视、电脑，没有种满蔬果、杂草丛生的庭院，更不要说习性各异的树木、藤蔓与飞鸟爬虫了。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。

今天，怀念起童年的庭院，心里一下子便有了一种温暖的感动。这不仅由于那里曾是我童年的乐园，也是因为我们大多已经失去或正在失去属于自己童年的庭院吧。在浮华忙碌的生活中，我仍旧向往着，不知什么时候，我能重温那小庭院的花香。

似乎已经成了一个无法实现的梦境：中国人的理想家居，传统的庭院生活，一个诗意的栖居，一处灵魂的乐土。我期望着，像民间传说和民歌那样产生出来的中国庭院民居，在现代的建筑思维乱花纷呈的混沌中，将来也许能给建筑发展的未来照亮另一块空间。



易水寒，七零后，河北人，现居长春，供职于某媒体。

个别生活 易水寒专栏

被绑架的道德

电影版《赵氏孤儿》显然比《史记》和传统戏曲中的《赵氏孤儿》要复杂。戏曲版十分血腥，屠岸贾找不到赵氏孤儿，决定杀掉全国的孩子，这是最早的宁可错杀千人，不可使一人漏网。程婴用亲生儿子换下被追杀的赵武，成就了千古佳话。电影版则着重描摹人性，刻画在激烈冲突中每个人物的心理矛盾。为什么要这么改？不是前者不好看，其实前者更具故事性、传奇性，而是其价值观已不适用于今天——让亲生儿子替别人死，在“一对夫妻只有一个孩儿”的今天，模仿难度实在大，必须通过所谓的“描摹人性”让今天的人深刻了解之、感动之、认同之直至学习之。

这恰是问题所在。我们首先应该认识到，程婴所为，只是个案，是特殊年代特殊人物的个人行为。他不保护赵武而是明哲保身也不该受到指责，不用亲生儿子做替身更没什么错。还有什么仿难度实在大，必须通过所谓的“描摹人性”让今天的人深刻了解之、感动之、认同之直至学习之。那么我就拼命打润滑油，从细节上涂抹、修饰，与今天的价值观无缝链接，目的只有一个，这个典范是千古的典范，到今天还应

以之为典范。这样说，不是要否定程婴的行为，也许，那时就是这么血腥，人命不值什么，殉葬、替死，都不像今天这么纠结，需要当事人反复掂量。彼时的普世价值如此，何苦非要以今天的价值重新解释？对古人的理解和同情，应站在彼时彼地理解，而非梳洗打扮、刻意篡改、重新包装，以便恒久远永流传。我们该敬佩程婴时还是要敬佩他，但不一定有样学样。时代变迁（包容，人人生而平等，不信任暴力，不宣扬有仇必报等观念逐渐深入人心），不愿意以程婴为楷模，也无需自责。

包括陈凯歌在内的很多人，潜意识里仍存在着如下思维：让个别的人性自觉，成为普遍的道德规范，抹杀个体差异。只要我们赞叹的，敬佩的，就必须跟他一样。实际操作起来，却是要求别人都是最高指标，要求自己都是最低指标（话说回来，即使他真的说到做到，敢于第一个跳进火坑，也没权利要求别人都跟着他跳，除非别人自愿）。也正因此，造成了我们今天的无意识困境：每个人都想创造一种道德模式，并竭力绑架全体人类跟随他。文艺作品、文学作品和各种史料都是潜在的教材，所谓春秋大义，所谓文以载道，皆如此。这才是我们需要警惕的。

以文为戈 刘武专栏

班纳吉先生的眼泪



刘武，导演兼制片人，曾任大学讲师、新闻记者，出版过《醉眼看乾坤》、《生命的几

一个 70 多岁的老人在我面前流下了眼泪，这老人还是位外国人，是个印度人，他让我感受到有种感情是不分国界的，有种思念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。

那是我在印度的加尔各答采访的一位退休老人，他叫比西·班纳吉。他的家不大，大概超过 50 平方米，没有什么装修，地面还是水泥的。不过，班纳吉先生是个具有某种特殊色彩的人物，据说他曾参加过上世纪 60 年代初的中印边境问题谈判，但此后一直没有得到重用，也没有机会再到中国。

最使我感兴趣的是，他曾是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大学第一批印度留学生。我跟他见面时，他仍然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，虽然发音有些含混，但跟我用普通话交流几乎没有太大问题。他也是在印度旅行中遇到的少有的能用中文跟我交谈的印度人。

他翻出好些老照片给我看，那是他在北京的珍贵记忆，他还记得照片上的每一处背景。照片中有他与同学的合影，也有他单独在北京的留影，其中一张是他戴着棉帽站在冰面上快乐地笑着，我猜想他曾无数次拿出这些照片，细细回味北京的留学生活。他告诉我，他在北京大学学习了 5 年，当时他的同学大都是外国人，中国人很少，他们中有前苏联、缅甸以及东欧的学生。直到 1960 年他才回到印度，本来在外交部工作，但几年后失去职位。

但班纳吉先生一如既往地热爱中国和汉语，退休后他参加了亚洲学会的工作，一直研究汉语，编写了一本有关汉语图书编目的书籍。我采访他时，他刚刚编完另一本有关汉语的书籍，还没出版。这些年来，他就中印友好关系发展问题写了很多文章，有空也教印度学生学习汉语。他说：“现在印度能讲汉语的人不多，如今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一天比一天增多，这方面的人才也

很缺乏，我还可以做点相应的工作。”

当回忆在中国学习的经历时，班纳吉先生常常流露出对中国的深深留恋。他抚摸着那些珍贵的有些发黄的旧照片，动情地对我说：“我跟泰戈尔一样，对中国都有非常深厚的感情。我有很长时间没去中国了，很希望再去中国，看看中国现在变化有多大。我最希望中印两个大国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好，两国人民能长期友好下去。”

我问班纳吉先生，要是真的能面对当年的中国老师和同学，他会说些什么时，老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，说着说着几乎泣不成声。他清晰地用汉语说：“我想回到我的母校，看看那里的老师……我希望他们还能记得我。”

那一刻，我的心也颤抖了一下，不知道用什么话安慰这位老人。他任由那些伤感的眼泪流下来，没有去擦拭它，让它在沧桑的脸上留下斑斑痕迹。

等我临走时，班纳吉先生又用熟练的中文在纸上写下一段感人的话交给我。那上面写的是：“我很希望再到中国去参观我的北京大学，去看现在的改变怎样，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再到中国去。如果我能去，我一定很高兴，我很想我将能去。”

那些字有点像孩子写的，忽大忽小，有些字的架构很松散，但我却不难从这些字中读出一个印度老人积淀多年的感情和梦想。

直到今天，我不知道班纳吉先生是否有足够的积蓄到中国旅行一次，也不知道他是否实现了回北京母校看看的心愿。但对我而言，每当我听别人说起印度，或者看到各种各样的印度生活图片，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班纳吉先生沧桑的脸和动情的眼泪。

那眼泪流在他脸上，却湿润了我的记忆，也湿润了我的心。